

新疆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ISSN 1009-5330, CN 65-1211/F

《新疆社会科学》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研究——兼论主场全球化与统一大市场
作者：王兵，吴福象
网络首发日期：2023-04-23
引用格式：王兵，吴福象.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研究——兼论主场全球化与统一大市场[J/OL]. 新疆社会科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5.1211.F.20230421.0954.006.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研究*

——兼论主场全球化与统一大市场

王兵 吴福象

内容提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依托基于内需的“主场全球化”开放思维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支撑地位，重塑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地理、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文章对全球化分工下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和演进逻辑进行梳理，对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内在关系进行阐释，对通过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路径进行探索。研究表明：中国参与客场经济全球化的优势渐失，转向主场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新一轮全球化战略调整的需要；通过重塑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正确处理国内产供应链地理重塑和全球产供应链地理重塑的关系、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关系以及科技自立自强和对外合作的关系。为此，一方面需要依托国家战略区域优势，深化国内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国家开放平台的集成功能，扩大向东向西双向对外开放，进而推动国内国际两个经济循环的战略互动和融合。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业链供应链；地理主场；全球化；统一大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王兵，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吴福象，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3）。

一、引言

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确立基于内需的“主场全球化”的开放思维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支撑地位。在百年变局、中美经贸摩擦、后疫情等多重时代特征叠加的背景下，国际产业竞争日益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拔河博弈”已成为国家关键核心能力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也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2017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呈加剧态势，美国逐步将中国从产业链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与贸易制裁对象，其政策倾向已从相对单一的经贸制裁转向关键产业链供应链战略霸凌。^①2021年以来，美国开始推行“友岸外包”的产业外交政策，酝酿和制定蚕食策略、局部脱钩策略、同盟封锁策略、区域排挤策略，^②试图通过“俱乐部治理”模式，构筑“小院高墙”，来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安全体系，并将中国排斥在外，继而迫使在华制造业向其“友岸”国家转移。同时，全球化的转向也给全球市场运行与全球价值链重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跨国公司战略开始分化。^③

站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十字路口，中国如何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如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治理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研究”（20&ZD123）、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22JJD790033）、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专项暨江苏现代财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课题“优化支持江苏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23JZA002）、南京大学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课题“长三角实践创新中国发展经济学：区域竞争与区域一体化”的阶段成果。

①张其仔、许明：《美国供应链霸凌对全球产业链分工与稳定的影响及应对》，《国外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②张杰、陈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研判与维护策略》，《改革》2022年第4期。

③史丹、余菁：《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跨国公司战略分化——基于全球化转向的探讨》，《经济管理》2021年第2期。

积极主动参与新一轮全球化以应对全球变局？这些问题是新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理论观点的阐释内容。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然，这是中国为应对全球变局而提出的基于内需的“主场全球化”开放思维。^①2022年3月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又明确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显然，这指明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可见，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参与主场全球化可以依赖的工具和基础。^②

那么，如何利用中国“主场全球化”的开放思维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支撑作用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则是需要首先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全球化演进模式出发，从全球价值链（GVCs）分工视角探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并在此基础上，从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角度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本文认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加速重组的外部环境下，通过重塑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地理、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让产业循环留在国内而非向境外大规模迁移，对于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理论探源

21世纪之前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全球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有五个主要特征：一是全球竞争导致了新的生产中心出现；二是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三是跨国公司的分散与重组；四是全球金融体系加强了国际生产和贸易；五是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调整和国家政策变化。^③而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则体现出更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这种特征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20世纪末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承接了由英、美、日和“亚洲四小龙”主导的前三波全球制造中心转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已经得到显著提升。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旧有的全球化暴露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以致于“逆全球化”迹象频现。近年来，由于美中贸易摩擦、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冲击，“逆全球化”思潮再度涌起，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开始以“朋友圈”解构原来WTO框架下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似乎正在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例如，美国基于“国家主义”屡次祭起关税壁垒、长臂管辖、贸易限制等“杀手锏”；英国“脱欧”；疫情期间的美、日的制造业回归计划；欧盟、美国分别出台《芯片法案》；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升级计划；欧盟的弹性供应链计划等。两大经济体阵营在对外开放、全球化分工问题上的矛盾，已经并将持续对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造成重大影响。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国际经贸格局亟需通过重塑以寻求持续发展的新动能。而世界经济格局重塑过程，既具有传统发展格局逐渐式微的历史必然性，又具有新发展格局兴起的新时代特征。

（一）传统“全球三极”式发展格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变化共同导致了一种

^①王兵：《供应链参与规模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兼论中国的主场全球化》，《经济学家》2022年第11期。

^②凌永辉：《新发展格局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体制障碍、突破路径与政策取向》，《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③（美）芭芭拉·思多林斯：《论全球化的区域效应》，王镭、沈进建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10-113页。

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最基本的变化是从军事对抗的两极系统到基于经济上的竞争与合作的三极系统的转换。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事实上是由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极点”组织起来的，是一种“全球三极”（TriadPower）式发展格局。^①“全球三极”中的美国除了与日本和西欧（主要是欧盟国家）存在相互的经济联系外，还与拉丁美洲（美国“后院”）有着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关系，构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一“极”；日本与东亚和东南亚联系密切，在亚洲范围内构成了以日本为核心的一“极”；欧盟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主要在具有“宗主国-殖民地”影响力的非洲地区，构成了以欧盟为核心的一“极”。^②

从本质上讲，“全球三极”式发展格局，是资本主义势力构建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政治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强强联合且相互依存的多边体制，经济上表现为依托北美、欧盟和亚洲的贸易投资区所构成的区域化体制。这种政治经济结构被称为“非霸权的相互依存”。^③然而，事实上，这种全球经济治理理论是资本主义世界主流国际经济学指导下的“霸权稳定论”，^④是一种政治性明显的“俱乐部治理”模式。^⑤在这种模式主导下，全球经济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传统发展格局的这种不稳定性 and 逐渐式微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总是会建立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并试图持续增强自己在该体系中的控制地位，抑或是通过重组规划和设计新的“游戏规则”来抑制竞争和制造经贸摩擦，以达到削弱对手的目的；另一方面，“全球三极”推动的是“中心—外围”式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发展，“外围”经济体只有依托“核心”发达国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然而，从发展的现实看，“外围”的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经济体的发展却离“中心”的发达国家越来越远，陷入了长期贫困、衰退、低等（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被盘剥和掠夺的境地。此外，从 GVCs 分工的利益分配上看，发达国家多以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技术（底层核心技术、领先技术）等参与分工，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多以劳动力、厂房、土地、生态资源等要素参与分工，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还会利用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品牌市场等价值转移方式、产业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等底层技术锁控方式进一步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被纳入了发达经济体主导的 GVCs 分工体系，但是却被长期锁定在低端环节，而欠发达经济体甚至无从参与 GVCs 分工。

（二）“客场全球化”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余年，中国在全球三“极”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此阶段，中国的发展格局也是双循环格局。不过这种双循环发展格局是中国瞄准全球市场进行出口导向型的、以“客场全球化”为主的发展格局。^⑥这一全球化战略得以成功，关键在于中国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比较优势，总体上表现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产业链供应链的生产环节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全球布局，形成了“研发设计→原材料供应→中间零部件生产→最终品装配

①（英）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刘卫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64-66 页。

②（美）芭芭拉·思多林斯：《论全球化的区域效应》，王镭、沈进建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年，第 354-356 页。

③（美）芭芭拉·思多林斯：《论全球化的区域效应》，王镭、沈进建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年，第 69-70 页。

④裴长洪、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

⑤王兵、李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世界经贸格局重塑》，《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

⑥刘志彪、凌永辉：《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品牌设计与市场营销”的纵向价值链分工。这种纵向价值链分工模式为中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代工、融入国际循环提供了契机。中国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出口竞争优势，进而在出口拉动下，实现了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出口导向型的全球化生产分工中，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在低技术零部件生产和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进行国际代工，而 GVCs 首尾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虽然，这种两头在外的“客场全球化”模式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生产者驱动型或购买者驱动型 GVCs 支配结构看，中国本土企业仍然难以沿着跨国公司和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主导的 GVCs 实现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

在“客场全球化”模式中，中国企业以依附方式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长期被“锁定”在 GVCs 低端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①②}一方面是 GVCs 分工结构本身存在封锁效应。比如，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制造业锁定在了 GVCs 低端的价格竞争之中；^③发达国家通过 GVCs 分工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生产体系之中，整合并控制具有禀赋优势的诸如研发、技术和品牌等战略性资产，而将发展中国家配置在最终产品低端环节；^④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缺失，且面临基础研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共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滞后等问题；^⑤美国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构筑“小院高墙”给中国制造业 GVCs 攀升设置多重障碍；^⑥美国对外反倾销举措也对参与 GVCs 分工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⑦另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前三十余年的基本国情使然。在国内需求和供给“双弱”的情形下，本土企业只能凭借生态资源、土地、劳动力等廉价生产要素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进行国际代工、参与全球化生产和贸易，开展客场经济全球化。^{⑧⑨}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土地和生态等自然资源约束凸显，“客场全球化”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同时，中国本土企业因长期开展以低端要素生产和以出口代工为导向的产业链供应链贸易，获得“平均利润小、规模利润大”的“相对满意”的利润率，从而陷入“温水煮青蛙”的陷阱，进一步地使中国制造业长期“重生产、轻设计”“重装备、轻软件”，以至于在制造业关键基础原材料、关键工艺流程技术、关键元器件研发领域被“卡脖子”，在关键工业软件和数字平台等智能制造领域被“扯神经”，在产业底层技术标准、行业规则设置和品牌控制力等方面被从源头上精准锁控。

三、“主场全球化”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逻辑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跃迁，中国的比较优势正从廉价要素向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动态转换。为此，中国需要适时进行全球化战略调整，把以代工出口导向为主的“客场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的“主场全球化”。从“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凸显了对内开放的重要性。^⑩“主场全球化”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旨在对全球开放和挖掘本国市场，充分

①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

②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③余东华、孙婷、张鑫宇：《要素价格扭曲如何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2期。

④安礼伟、马野青：《国际经济秩序：中国的新需求与政策思路》，《经济学家》2019年第1期。

⑤芮明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思想、目标与路径》，《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⑥黎峰、曹晓蕾、陈思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供应链的影响及应对》，《经济学家》2019年第9期。

⑦黄永明、潘安琪：《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例的经验研究》，《国际贸易探索》2019年第4期。

⑧刘志彪：《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若干断想》，《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⑨刘志彪、凌永辉：《在主场全球化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前提、重点任务及政策保障》，《产业经济评论》2021年第6期。

⑩刘志彪：《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利用超大规模内需优势虹吸全球高级生产要素来发展创新经济，加速实现中国的基本现代化。其中体现的新逻辑是“扩大内需—虹吸全球资源—发展创新经济—以基础产业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构建国内经济为主体的大循环格局—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逻辑可从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及突发性危机、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以及中国参与 GVCs 分工的新变化三个方面着手。

（一）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及突发性危机

从内部因素看，长期以来，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采取的是出口导向战略，中国制造业企业以参与国际代工方式融入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获得了丰厚的全球化红利，成就了中国的外资外贸奇迹。然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 GVCs 分工体系中，中国企业以依附方式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也造成了内需和出口之间的结构性偏离。中国要摆脱在 GVCs 分工中的低端延伸、高端被压缩的困境，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经济循环，构建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内需主导型 GVCs。依托国内超大规模有效内需市场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化产业分工机制，将成为中国化解内需和出口间结构性背离的关键机制，也有利于中国顺应 GVCs 分工体系的转变。^②

从外部因素看，后金融危机时代，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抬头之势，给全球经贸活动及全球经济治理环境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尤其是 2018 年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加剧之势，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排斥和压制不断升级。美国狙击中兴、断供华为、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实施长臂管辖、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开展“中国+1”的友岸外包政策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了美国力图控制全球核心产业链供应链的野心，也说明中国对某些“高精尖”零部件具有进口依赖性，映射了中国供应链体系脆弱的一面。加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蔓延和反弹，以及俄乌冲突的冲击，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频仍，产供应链上下游的“长鞭效应”也将威胁中国在国内外部署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安全。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下，中国制造业依然面临着跨国公司主导的某些高端制造业及部分传统制造业向具有资本和技术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印度和东盟等具有要素成本比较优势的国家转移的“双重挤压”困境。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把依靠外需的经济全球化转化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在国内主场发展创新经济，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不仅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开国际经贸摩擦，而且可以吸引和集聚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和资源，重组国内国际供应链体系，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庞大的中国市场。因此，构建基于内需的以“主场全球化”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对外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对内“强链、补链、延链”以实现“产业强基固本”的根本举措。

（二）中国具备构建主场全球化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

首先，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是中国当前新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这一比较优势，一方面，能够吸引全球企业进入中国大市场，促进专业化分工，虹吸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尤其是全球创新要素；另一方面，中国凭借大市场和大消费需求能够激励实体经济发展，稳定就业，提高人民收入，进一步刺激消费。

从经济体量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 GDP 总量突破 121 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 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将达到 30%。从消费规模看，2021 年，中国大陆总人口达 14 亿人，全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65.4%，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得到巩固。然而，由于 2022 年受疫情冲击较大，全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32.8%，但疫情后的消费复苏

^①刘志彪：《重塑中国经济内外循环的新逻辑》，《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7 期。

^②凌永辉、刘志彪：《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特征与政策启示》，《经济学家》2020 年第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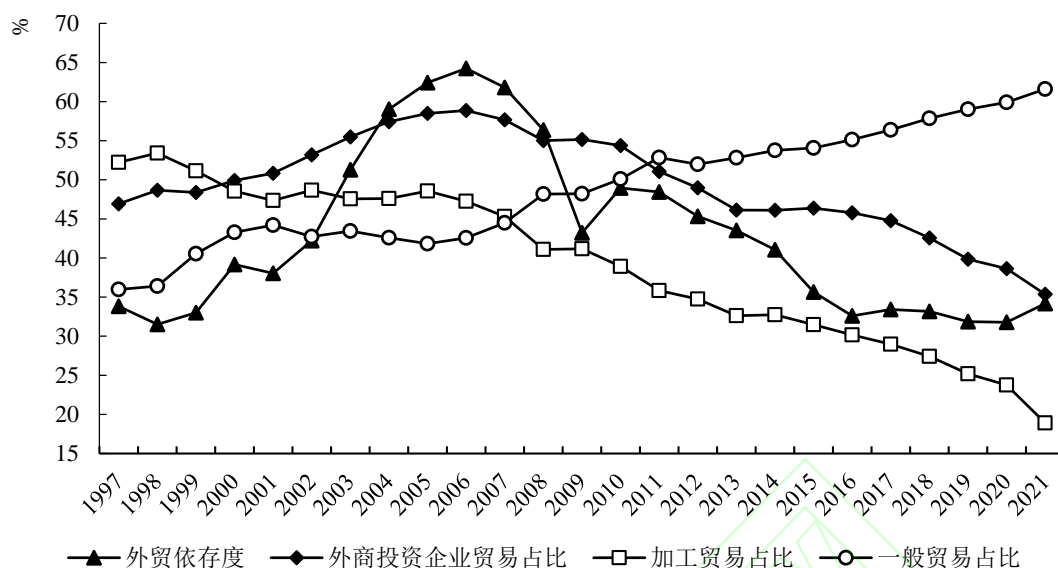
是确定性事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均 GDP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 1.27 万美元，超过世界人均 GDP 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属于并将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消费和内需规模方面，中国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此外，根据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领先的产业配套能力，能够为国内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试金场”。比如，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2 年，中国市场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金额达 57.21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1%，其中第二产业投资达 18.40 万亿元，增长 10.3%；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 1891 亿美元，增长 8.0%。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含通过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 4519 家，虽然新增数量较 2021 有所下降，但其对华直接投资金额高达 137 亿美元，增长 18.6%。全年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683 亿美元，增长 30.9%。由此可见，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能够为中国打造基于内需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始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经济迅速地融入世界经济中；二是中国各类经济单位与区域性和全球性生产网络及供应链建立了联系。^①从图 1 中描述的中国外贸依存度、一般贸易占比、加工贸易占比和外商投资企业贸易占比来看，中国“主场全球化”优势开始显现。一是外贸依存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2006 年达到最高值，2008 年金融危机后，出现大幅下降，2010 年小幅回升后基本呈现下降趋势。呈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不确定性外生冲击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比如，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了基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战略，基于庞大国内市场的内需优势开始凸显。二是加工贸易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一般贸易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两者形成“剪刀差”。这主要是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结果。以往的加工贸易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制约着中国出口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然而，自 2003 年中国首次明确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后，加工贸易企业开始更多地使用国内原材料和中间品，贸易方式逐步向一般贸易方式转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延长了产业链供应链。不可否认的是，贸易方式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甚至服务贸易方式转型升级也需要一定的转换时间和转换成本。三是外商投资企业贸易占比平稳下降并与一般贸易占比的变动趋势形成“剪刀差”。呈现这一趋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外资企业的撤离；一方面则是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内需规模扩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开始不再过度依赖加工贸易出口，而开始积极开拓国内市场，以实现“出口转内销”，这也是近年来外资企业奉行“*In China For China*”（地产地销）理念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区域性与全球性生产链和供应链中的参与规模扩大，国内企业的外贸参与度提升。^②这为中国深度嵌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刘民权：《全球化中的中国中小企业：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金融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②王兵：《供应链参与规模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兼论中国的主场全球化》，《经济学家》2022 年第 11 期。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其中，2021年数据为估算数。

图1 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

其三，中国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机会不平等”和“地位不平等”的突出矛盾不断积累，构成了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①②}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许多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由于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地缘政治等条件约束，未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而在国际分工中被边缘化，而像中国这样能够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在“客场全球化”中面临“地位不平等”的困境。因此，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经过近十年的部署与实践，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从亚欧大陆延伸到了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的整理，目前中国已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涉及基础设施、贸易、科技、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扩大了中国对内统筹、对外开放的范围，正在重塑中国东西双向开放的经济地理，推进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同时，通过构建“以我为主”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推动重构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为更多国家和地区提供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机会均等、地位平等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参与GVCs分工的基础和特征面临新变化

首先，中国参与GVCs分工的基础，将由“弱约束”下的产品内分工，逐渐演变为“强约束”下的产品内分工和工序内分工。其中，“弱约束”主要是指要素禀赋约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技术、市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国际分工从以产业和产品为界限的分工，向跨国公司主导的以要素为界限的产品内分工转变。^③而“强约束”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将更倾向于以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为前提，而忽视部分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反复以及俄乌战争冲突，让跨国公司直

①戴翔、张雨：《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对策》，《中国经济学人》2021年第5期。

②张二震、戴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新趋向及其对策》，《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10期。

③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经济学家》2018年第1期。

观地认识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分销网络会受突发状况影响而遭到破坏，疫情、战争和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动摇 GVCs 分工体系的要素基础。因此，后危机时代，跨国公司必将重新审视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功能作用。当跨国公司以“开放、效率和安全”为原则组织全球化生产时，可能会面临一个“新三元悖论”，即效率、利润和生产的稳定不能同时兼得，跨国公司或将放弃一些效率或者利润以保证生产的稳定。

其次，中国参与 GVCs 分工的特征，将在以要素为界限的精细化和切片化分工特征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地理层面的本土化分布、区域化分布、“链主—链群”式分布以及供应链切片的“多元备份”式分布。供应链地理的本土化分布是指，出于产业、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考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布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本土化收缩，即部分国家和地区将鼓励产业回流，使得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迁回本土，修复上一轮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本土“产业空心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样需要巩固本土的产业链供应链，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产业链供应链地理的区域化分布是指，中国将基于国内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相对独立、完整、安全、稳定的产业链，并与地理邻近的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构建国内的或者区域化的“全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供应链地理的“链主—链群”式分布是指，在区域化特征基础上，培育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的“龙头”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链主”，并通过“地理邻近效应”和“市场邻近效应”连锁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相关企业集聚，形成“链群”。产业链供应链切片的“多元备份”式分布是指，产业链供应链切片的上游供应商应该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尤其是产业链核心环节和容易被“卡脖子”的环节更应该积极搜寻和培育备份供应商，以防止对单一国家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过度依赖。

值得强调的是，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关起门来搞产业”，实现产业链所有环节的自主生产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现实。事实上，中国参与 GVCs 分工的三个新特征的隐喻，正是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效率和安全”的基础上，以“全产业链”思维，培育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控制权”，提升中国在 GVCs 分工中“占位”的话语权。

因此，中国实施“主场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就在于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吸引全球高质量的要素和资源，在国内主场发展创新经济，实现供应链稳定和产业链现代化，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扩大向东开放的同时深度向西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齐头并进，让中国成为全球性的开放市场。

四、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内在关系

从地理空间层面，产业链供应链是各生产环境依据不同的区位条件优势而组成的地理空间分布形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空间布局由各节点的地理位置分布决定。随着全球化的演变，传统的垂直一体化分工被打破，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同环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 and 重构成为主流，随之而来的还有国际高端要素的流动和再配置以及区域产业转移。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逻辑看，构建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任务是推进未来中国产业的基础再造和产业链升级。自然地，在全球化 4.0 背景下，重塑国内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也将成为夯实国内产业基础、重构世界经济和产业版图的重要抓手。正如美国著名的全球战略家帕拉格·康纳所认为的：“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正在‘抹掉国界’，互联互通已经取代区隔成为全球组织创新的新范式。与此同时，国际间地缘政治的较量，也逐渐从领土之争转向互联互通之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拔河博弈’。”^①这里的“全球供应链”，即是指地理经济学意义上基于 GVCs 分工的能源资源要素国际配置，以及全球生产活动的空间组织形态。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转向重塑国内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需要特别强

^①（美）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崔传刚、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3页。

调的是，通过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新发展格局应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的关系。在“主场全球化”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统筹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两个大局，并非要将两者切割后平行推进，而是要通过重塑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深度嵌入和引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重塑。因此，通过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基于国内供应链（NSCs）和国内价值链（NVCs）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二是基于全球供应链（GSCs）和全球价值链（GVCs）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前“客场全球化”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单纯地要求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服从来自跨国企业的治理命令和规则，接受其外包订单。而“主场全球化”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则对国内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一方面要求以主场优势虹吸全球创新资源，以市场需求自主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进行发包，将产出向全球市场销售，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并通过国内龙头企业、隐形冠军企业或本土跨国公司的链主作用嵌入全球创新链，成为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因此，重塑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地理，要求加快构建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全球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形成，^①其中关键是要通过产业转移和产业更新，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推进国内各地区的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国内产业空间优化分布和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联动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国内价值链和国内创新链。而重塑“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地理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关键是要跨越国界，超越政治地理，实现互联互通。^②其中，国内价值链和创新链链接的区域分工网络，能够增强中国地区间经济周期的联动性，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协同共进，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第二，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扩大对内开放的关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在地要求持续扩大开放，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当前中国经济开放的战略思路，是通过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过去利用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加速了国内市场化、国际化进程。近年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外开放对传统体制机制改革的倒逼效用正在边际递减，迫切需要对内开放形成新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推动体制内“权与利”关系的“深水区”改革，进而推动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亟需解决的要害错配、土地财政、行政区经济、国企改革、产权结构等问题，无不涉及政府职能和权力的调整和优化。只有在对内扩大开放中，让国内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在自由活跃的条件下充分涌流，才能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对内开放不足，则会制约进一步地对外开放。比如，国内地区行政区经济的制约，影响了地区间按现代产业链的要求进行分工协作的可能性，这种互不协调的非一体化竞争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在国内主场的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从而可能出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技术链的“断链”和“脱钩”，进而制约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集群竞争的能力。

第三，正确处理科技自立自强和对外合作的关系。重塑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地理，就是要加快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效能提高。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就是要通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能力的强化，更深程度地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对接，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这就要求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中，逐步实现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威胁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制约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发展瓶颈，并造成了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缺乏议价能力，继

①张杰、陈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研判与维护策略》，《改革》2022年第4期。

②吴福象、王兵：《“自然”本性、“一带一路”建设与供应链地理重塑》，《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而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①从中国企业长期被锁定在 GVCs 低端的现实来看，其中更直接的原因是“系统技术主导产品、研发主导生产”的逻辑。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传统的“拿来主义”式技术逆向研发越来越行不通，必须坚持把创新驱动和科技自立自强。在重塑新的产业链供应链过程中，建立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平台，推进“点式突破”和“链式协同”相结合，既要集中力量突破制造业核心环节的“卡脖子”技术，又要以重点产品为龙头进行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建设，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推动产业链式突破，进而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向高端升级，提升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同时，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开放合作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应有之意，而自立自强是能够相互平等、相互尊重进行开放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资本充裕优势、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优势，一方面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虹吸全球创新资源，有助于在“主场”开展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另一方面推动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合理布局、全面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有助于在“客场”开展全球科技创新合作。

五、通过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路径

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通过稳内促外，以外带内，内外协同的路径导向，继续扩大依托国内配套及国内市场的国内大循环，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效融通好国内市场 and 国外市场，^②进而加速中国向基于内需的主场全球化模式转变。

（一）依托国家战略区域优势，重塑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

重塑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依托国家战略区域优势，集聚国内外高级资源要素，吸引优势产业集聚，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地理空间，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进而以产业链供应链“链主—链群”优势将国内传统意义上的“块状经济”发展为“走廊经济”、“轴带经济”和“枢纽经济”。目前，中国国家区域战略可以概括为“‘一带一路’、三区、两流域”：“一带一路”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三区”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流域”指的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为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要从产业合作与产业转移两个方面重塑国内供应链地理和国内经济大循环。

第一，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中的产业合作。从 G60 科创走廊的覆盖范围和延伸空间看，可将长三角区域的产业空间划分为南北两翼。从产业类型、驱动主体和驱动方式上，可以说长三角北翼产业带依赖的是技术支撑，依托的是国家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体系的“神经网络”；长三角南翼产业带其根植性产业所依赖的则主要是强大的内需市场，是产业体系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③属于民本经济。简言之，长三角北翼产业带实行的是“先技术后市场”的发展模式，长三角南翼产业带实行的是“先市场后技术”的发展模式。深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产业合作，要推动实现长三角区域“技术+市场”并行的发展模式。北翼的“园区经济”，早期在参与外资代工和配套生产时，形成了引进、消化、模仿、吸收再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技术路径。随着北翼产业带商务成本的攀升，倒逼园区内企业必须依托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枢纽和轴带，通过园区开发、园区共建、电商平台合作等方式，发展“园区飞地”、“境外飞地”和“跨境电商”模式，以开拓国内外市场空间，推动产业转移，实现“技术+市场”的并行发展。长三角南翼的“订单经济”和“电商平台

^①段巍、王兵：《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理论与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4-12（第 A03 版）。

^②徐华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时空演进、逻辑框架与路径导向——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视角》，《新疆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

^③吴福象：《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产业合作》，《浙江日报》2019-05-09（第 13 版）。

经济”模式，需要实现对平台技术的自主控制权。以支撑电商平台的核心元器件芯片为例，在当前国际核心技术竞争白热化背景下，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需要，这些巨型网络平台企业，迫切需要借助长三角一体化的优势，利用北翼产业带在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和生产方面的优势，围绕“中国芯”的研发和生产，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进而拓展到芯片材料和芯片研发等环节，最终实现“市场+技术”的并行发展。

第二，通过长三角对口中西部产业转移重塑中西部产业链供应链地理。中西部地区可依托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培育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比如，“一带一路”、“新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区域为承接产业转移和厚植本土产业升级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红利；全国范围的运输网络、通信网络的基本建立和完善，实现了地区经济体的互联互通，基本形成了向西开放、对内开放的空间格局；“中欧班列”的开通，加快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速度等。因此，中西部地区同样具有较大的内需和外需规模，可以顺势承接东部地区向东南亚转移的部分产业，依托经济廊道、经济轴带、经济枢纽发展“走廊经济”、“轴带经济”和“枢纽经济”。比如，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内价值链的总部或链主，可以按产品内分工原则，通过国内价值链治理机制，向长江中上游的中西部地区转移某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托长江沿线集中的城市、人口、产业、市场，率先形成区域统一大市场，放大长江流域一体化发展效应。同时，长三角地区可以对口中西部条件成熟省份合作共建中小企业产业集聚区，通过中小企业园区建设，使中西部地区能够在空间上整合一批本土相关中小企业、承接一批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发展一批配套产业，逐渐形成“长三角链主—中西部链群”模式，提高中西部地区整体的产业竞争力。

（二）依托国家开放平台优势，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国际经济大循环

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构建国际经济大循环，需要重点依托国家开放平台的作用，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构建空间协调的“一带一路”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以及具有空间包容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而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

第一，发挥中国自贸试验区（港）的窗口和示范作用。中国自贸试验区（港）是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实现内生发展的新开放型经济的窗口。高质量推进自贸试验区（港）建设，可以充分利用国际投资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优势，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与国内外企业建立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尤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出台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容，标志着中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

第二，发挥沿海经济带中心城市的桥头堡作用。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的大部分中心城市，正在从传统生产中心向先进生产中心和综合服务型总部城市转变，有产业转移、对外投资、转口贸易和服务输出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与“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境外港口城市合作共建产业基地，这为中国企业投资开发海外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以“境外飞地”为据点的产业集群提供了开放平台。

第三，发挥中西部核心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的节点作用。一方面，要积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着力发展具有地区竞争优势的“工厂经济”。另一方面，串联“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节点城市，对接边境口岸和境外合作园区，扩大向西开放范围，以产业“链主—链群”形式抱团嵌入“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逐渐将通道经济、轴带经济发展成为大区域经济。同时，要充分借助 RCEP 协定签署的契机，打破亚洲区域贸易壁垒，打通区域内生产网络，加快形成区域统一、稳定的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经贸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背景下，RCEP 将成为全球新经贸规则的试验场和孵化器，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这将有利于中国在“逆全球化”背景

下，持续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区域化和全球化的世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第四，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需要通过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开展广泛的产能合作，促进中国过剩的优质产能梯度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沿线国家。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加速第四轮第五轮产业转移，将有利于中国构建“以我为主”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促进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目前，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已基本形成以中国周边重点国家为主轴，以拉美重点国家为“东翼”，以非洲、中东和中东欧重点国家为“西翼”的“一轴两翼”合作布局，标志着中国进入主动塑造、运筹国际分工体系的新阶段，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重要的激活效应。^①具体地，中国开展广泛的国际产能合作，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实现产能疏解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有助于本土优质产业深度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上环流”；另一方面，有利于通过产业间垂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形式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被锁定在全球价值“下环流”的困境，^②从而形成中国双重嵌入 GVCs 分工的新体系。同时，通过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塑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过程，也符合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典型特征，即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和减少分割。其中，开展广泛的经贸合作，就是要提高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密度；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就是要缩短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距离；倡导“共同体”理念，就是要减少区域分割。

（三）国内国际两个经济循环的战略互动与融合

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经济循环，关键是要确立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主体地位。首先，要在破解“胡焕庸线悖论”方面有所作为，重点是要发挥“第二自然”和“第三自然”的协同作用，突破“第一自然”约束。^{③④}具体地，在推进新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大背景下，要充分利用中国在“两张网”（高铁网和互联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以及国家精准脱贫成果，加快推进胡焕庸线左侧“以人为本”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人口集中和产业配套条件的改善，培育后天性竞争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工厂经济”，培育区域性总部。“胡焕庸线”右侧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一方面要有序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某些供应链片段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另一方面要顺应新一代交通与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时代趋势，发展综合性、区域性和专业性等多种类型的“总部经济”。通过总部区域与工厂区域的联动，形成国内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在地理空间上的强关联。

其次，要构建“以我为主”的“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国在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所形成的“共轭环流”中居于枢纽地位，其中，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的良性互动空间收窄，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中有较大攀升空间。^⑤因此，在 GVCs 分工体系倾向于区域化集聚的趋势下，中国要不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中国国内价值链上的“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精造”、中国“智造”以及中国“创造”为主的“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最后，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及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需要“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构建具有空间包容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此，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主动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开展经贸磋商，力邀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实践，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搭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桥梁。另一方面，在美国设置的、旨在预防性破坏中国物质、经济、科技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下，

①孙海泳：《中外产能合作：指导理念与支持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

②张辉、易天、唐毓璇：《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经济科学》2017年第3期。

③刘志彪：《建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④吴福象、王兵：《“自然”本性、“一带一路”建设与供应链地理重塑》，《河北学刊》2021年第1期。

⑤洪俊杰、商辉：《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理论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中国还需要具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并避免建立与既有体系规则平行的替代性经济体系，^①这是中国经济“极限生存思维”下的必要考量，也是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性和包容性所在。



^①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